

* 學人介紹 *

劉起鈞教授訪問記

蔣秋華*

劉起鈞先生，湖南安化人，1917年生，1947年中央大學研究生畢業。曾任國史館協修、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研究組長，現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89年，赴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院大學、二松學舍大學、大東文化大學、京都大學講學。1992年，再度應邀赴東京講學，著有《屈原傳》、《兩周戰國職官考》、《歷史檔案的整理方法》、《先秦史料學》、《尚書述評》、《顧頡剛先生學述》、《尚書源流及傳本考》、《春秋左傳學的流變遞嬗》（收錄於《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尚書學史》、《古史續辨》、《尚書校釋譯論》、《禹貢地理叢考》、《春秋左傳研究輯證》、《史記夏本紀譯注》、《日本的尚書學及其文獻》、《劉起鈞經學論集》、《三禮大要》、《古音韻大要》（二《大要》皆講課底稿）等。此次應本處之邀，訪問研究三週，除於本處作兩場專題演講外，並接受訪問，以下即專訪之內容。

問：請您簡述一下求學的歷程與主要的研究範疇。

答：我自幼受我祖父教讀，祖父吟古先生是清末有名的古文經學家王先謙先生弟子，當我上小學已經識字後，便於每天晚上和寒暑假期間，按儒家傳統教育方式對我循序施教。從《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入手教詩文，從《文字蒙求》入手教清代小學，從《孟子》入手教經籍，到我十四歲時，特費心力地教完《左傳》。並囑我每年溫習點讀一遍，我在他逝世後遵囑按年點讀，直到離家至長沙讀高中時。

* 本處助研究員。

所以我自幼承受的是古文經學的薰陶。

一九四一年秋進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陣營強，我從所聽各個老師專業講授中，增益了我的學力，擴大了視野，自己感到接觸的學術領域寬廣多了。而影響最大的則是顧頡剛先生。除了他襟懷闊廓醇厚，從他問學如坐春風，有恢恢乎學術廣淵之美，更從聽了他講「春秋戰國史」課，震聾啓聵，受到學術上的激盪，過去自以為頗熟習的《春秋》和《左傳》，沒想到有這麼多問題，因為古文經學派基本相信漢代古文經說，而顧先生在「春秋左傳學」上，完全承受清末今文學派之說，兩個迥然相異學派之說交集於我身，過去只知墨守，現在則開始知道今文學派能以辨疑精神進行考辨。加以顧先生新的精深的考辨，就使我感到過去等於對《春秋》、《左傳》完全沒有認識。雖然對今文學派對《左傳》所提出的具體觀點（說是劉歆偽造），我並不同意，但認為對經籍文獻的考辨精神是可取的，開始明確認識以後對經籍文獻一定要採取這樣的考辨才行（顧先生這一課程，我當時用文言文做了筆記，到1988年才出版）。顧先生又叫我在一年級的課餘時間裏標點一遍《尚書》，他看了後，覺得標點不錯，但問我有問題沒有，我說都按《孔氏傳》釋義標點通了，沒什麼問題。他笑了，指出《尚書》是五經中問題最多的一部，而我不知道；要知不能發現問題就不能做學問，要做學問，不要墨守傳統，要善於從傳統觀點中解放出來；發現新問題，才能開啓學問之門。他這些教導，使我此後能走上治學之路。

一九四五年，我為顧先生的研究生，開始接觸《三禮》，顧先生又以今文經學家的看法告訴我，《周禮》是劉歆編造的偽書。我為了要研究周代官制，就只能從《周禮》以外的先秦文獻中，搜集周代官制資料，結果我發現《周禮》所據資料，不出春秋時周、魯、衛、鄭官制範圍，與春秋時其他國家官制無關，更與戰國官制無關。我把這看法告訴了顧先生，是與他的觀點對立的，而他卻支持我繼續研究下去，我為他能容納不同學術觀點所感動，更有信心不顧舊有成說，進行獨立思考。

研究生畢業後進國史館——一九五一年改組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整理處，我在此從事史料整理工作十餘年，接受新知，讀了一些哲學理論書，其中有歷史唯物論的主要著作。正像原習古文經學，後受迥然相異的今文經學影響一樣，現在又承受了與古代學術迥然相異的哲學理論，使自己認識又有所擴展，獲得一些分析問題、觀察問題的觀點和方法，對後來治學有益。

我後半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通過對以《尚書》為主的經籍的考辨整理，以進行古史研究。

問：您對《尚書》學的研究，用力甚勤，請問您是在什麼情況，在什麼動機下，開始研究的。

答：一九五九年起，顧頡剛先生奉命整理《尚書》，但他年齡已老，無力實際承擔此項工作。由於我大學時曾從他治過《尚書》，就在1962年請上級把我從南京調到北京，在他的指導下，實際擔任此項整理研究任務。這時我四十五歲，精力正旺盛，又頗習舊學，有承乏此項工作的基礎，因此對從事此項學術任務，非常愜意，願奮其所能，做好此項研究，便從以下兩方面用功：(一)先了解《尚書》本身。對它作出歷史的了解，自然就要對整個經學也作歷史的了解。前面一項後來寫出了《尚書評述》、《尚書源流及傳本考》、《尚書學史》諸書出版，後一項尚未及寫出專書，但留心搜集了一些經學史資料。(二)對《尚書》各篇內容進行研究。承顧先生〈大誥譯證〉所定體例，略加變通，進行撰寫《尚書校釋譯論》一書，迄今只完成五分之三。

問：您是顧頡剛先生的得意門生，必然承襲了他的許多治學方法，能否舉例說明一二？

答：前面說到我原承古文經學方法，那是偏於相信舊的經說的。後來受顧先生所承清末今文經學方法，則務在反對舊經說，提出新的考辨的。這也就是顧先生經常強調的，要能從舊的傳統中解放出來的精神。受此影響，就使我不再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為任何的權威意見所束縛，而肯獨立思考，從研究中得出結論。

顧先生在他治學中最注重發現問題，強調不能發現問題就不能做學問，否則就會把一切現存的東西看做天造地設，引不起對它的探索。這一點又深深影響了我，所以我在整理《尚書》過程中，處處遇到問題，有些是《尚書》本身的問題，有些是有關古史的問題，使我忙於處理這些問題，不再像大學一年級時標點它一遍也沒發現問題那樣了，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誘發我寫了不少考辨古史的論文。

顧先生最重視清代學者的實證精神和廣泛搜集資料的方法，所以特別注重淵博，反對只掌握非常不足的一點材料就大發空論，湊文章。因此必須先對所研究的問題了解其各個歷史時期的有關資料，按其先後來作排列、分析。其搜集資料的範圍，自然首先是書本文獻，其中有關此問題的資料儘量不讓它有遺漏，次則留意考古發現成果，我們自己分不出力量做考古工作，就正好利用考古工作成果，千萬忽略不得。還有生活中的所聞所見有足以佐證所研究之問題者，也要善於把握，善於捕捉。這就是他所說的多所聞見以證治史的方法。

這是顧先生治學方法中影響我至巨的拳拳者，其餘具體的撰寫文章的方法、判別史料的方法、勤於閱讀、勤做筆記的方法等等，論及的還多，這裏不備舉。就上面舉到者說：不為傳統所拘、善於發現問題、力求淵博、多所聞見、廣泛取材、依其先後演變之迹用以證辨。這幾點是顧先生治學的主要方法。

我運用顧先生這幾種重要的治學方法，例如不為傳統所拘這一點，使我有自信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說，即使師說我也敢不為所拘。例如顧先生承今文家說，以《左傳》、《周禮》等為劉歆偽造，兩千年來已定「五行」為金木水火土，鄒衍是陰陽五行說始祖等等，在我幾經研究後，確切論定以上諸說皆誤，提出了據客觀資料所得出的結論。

又如要注意發現問題，也可舉「五行」這個小例子。當我讀到《左傳》裏金木水火土穀為「六府」，又金木水火土為「五材」時，覺得這說得通，因為這五者確可稱五種材料（加上穀確可分六府典藏）。但把這五者稱為「五行」，覺得不通，它們怎麼行呢？這是一問題。有了這個問題，在繼續讀書中，就隨時遇到足以說明「五行」原是五星運行的資料，愜意得很，幾乎俯拾即是，只是以前讀書沒有注意到罷了。所以我終於寫出了關於「五行」原義的論文。

關於力求淵博、廣取衆收這點，我們看顧先生論文，沒有一篇不資料豐富，才使他的論文有說服力。我循其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雖然我還遠遠沒有做到淵博，但平常還是注意爭取博覽有關資料，隨時抄寫成卡片，有些資料所在原文獻較易找到的，就不抄原文，只作索引式的記錄其所在出處，以便隨時取用。而且總是先設法弄清楚關於該問題在各個歷史時代有些什麼書，或可能在些什麼書裏面，就有目的去找那些書，用上述方式，把資料記下來，所以到寫論文時，基本能找到所需資料。

問：顧頡剛先生為史學大師，因研究上古史，而對經書產生極大的興趣，您的研究路徑似乎也十分相近，這與傳統的經學研究，有何差異？

答：傳統經學研究，首先是持著尊經的態度，即使學派不同，其尊經態度則一。他們的目的是「昌明經術」、「宏揚聖道」。他們的是非標準是「考信於六藝」，合於經文的就對，不合於經文的就錯。總之他們以儒家經師身份治經。我們今天研究經學則不同，不再把經籍作為尊奉的寶典，而把它們作為研究的對象。正像研究生物稱生物學，研究地理稱地理學，研究物理稱物理學一樣，研究經籍稱經學，也是可以

的。不過它實際是文籍整理考辨之學，和其中所載古代思想研究之學，古代制度、古代歷史研究之學等，因此是把經籍作古代史料進行研究。不再是「考信於六藝」，而是「考信於理性」、「考信於科學」。顧先生曾說，我們今天研究經學，和古文家、今文家都不同，他們要尊經崇道，我們要把經書通過我們的研究，弄清原貌，了解它真相之後，經學就從此關門，以後就只有史籍考辨之學了。這是今天經學與舊經學的重要區別。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無論是古文家的文字訓詁及器數名物的闡釋，或西漢今文家與宋理學家的為聖人之道闡發議論，都只是書本上用功夫，在文獻中學佐證。在今天治經學，除了文獻材料的運用外，還要運用考古學、民俗學、社會學以及古史學等等的研究成果。

問：您的經學研究，著重於考據方面，對於義理的探求，卻沒有太多的發揮，其實這正是漢學與宋學的根本歧異之處，不知您對此有何意見？

答：上面剛提到西漢今文經學家給經典撰寫章句、傳、注，盡在闡述自己的論說，總是離題萬里，海濶天空，以當時瀰漫思想界的統治思想陰陽五行說為依據，馳騁空疏議論。如：「說〈堯典〉篇目兩字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增師法至百餘萬言」（皆見《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西漢今文家的經學著作流傳下來的，只有《韓詩外傳》、《尚書大傳》、《春秋繁露》三部。都是只引用一句或兩句經文，或經文中的一兩個詞彙，甚或只寄託在一個經文的篇題下，就闡發與經文毫不相干的議論，真是離題萬里。其所闡釋的中心思想，就是承自戰國以來諸家思想，主要融滙陰陽家、五行家、道家、墨家以及方士術數等等，於儒家思想中所形成的漢代宗教陰陽五行說所籠蓋的經說。因此西漢今文家經說，實際成為第一次新儒學，而非先秦不語怪力亂神的孔氏原儒學。東漢古文經學斥今文家為「俗儒」，力圖矯正，就從文字訓詁及器數名物的了解，來弄清經文原義，力求尋取孔子原有儒學要義，而不作漢代宗教思想的闡述。可以借用現代概念來說，西漢今文與東漢古文之別，是哲學闡述與科學整理之別，審慎一點說，是哲學傾向與科學傾向之別。到宋代理學興起，它不是遠承西漢經今文學（清末今文學才遠承西漢今文學），可是它與西漢今文學的精神遙遙相通。所不同的是，西漢今文學承用綜合戰國各種思想而成的陰陽五行說思想，宋代理學承用綜合自漢魏至唐盛行的儒釋道三家稱為三教合一的思想。所以宋代理學有人說是第一次新儒學，實際是精神上承西

漢第一次新儒學的第二次新儒學。它的經學著作，一如西漢今文經學著作一樣，都不是原來孔子儒學的原義，而是提出了新的更高哲學理論形態的新儒學——理學。到清代漢學興起，又恢復東漢古文經學。所以一般稱的漢學、宋學之別，實際是科學傾向與哲學傾向之別。每次新儒學都是適應當時時代需要產生的，成為有利於維繫當時社會的學說。而每次古文經學的興起，總是承新儒學末流的空疏無用之弊以後。我們今天的時代，有需要對儒學思想進行整理研究，而要真正理解儒學思想，必須正確弄清楚各個時代不同儒學思想，那就更有需要對儒學思想的載體——各種經籍，進行科學的考辨研究。這兩項研究都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完成，這就需要有學術的分工。像我這樣的人，備經逆遭坎坷，到了六十之年才獲得坐下來安靜寫作的機會，縱有滿腔宏願，既要整理《尚書》本身篇章文字，也願闡釋研究不同歷史時期的儒學思想，顯然時間已來不及了。而篇章文字的整理是必須先行的，才能免蹈空虛論。因此我如能抓緊時間，把《尚書》本身的篇章內容作出所說的偏重於考據的科學整理，把它完成，已經是萬幸了。至於儒學思想方面，義理的闡釋即哲學闡述，顯然無暇顧及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問：您撰寫的《尚書述評》、《尚書源流及傳本考》、《尚書學史》等書，引用了不少相關的資料，其中不乏罕見的著作，這些都是如何蒐羅來的？您又是如何研讀及運用的？

答：上面談從顧先生學習治學方法時，已談到要力求淵博，我當然沒有做到。但是對每個研究的問題，還是儘量尋取其有關資料。上面提到的要先弄清該問題在各個歷史時期有些什麼書，儘量找到那些書，而在那些書中往往引用或提到別的書，再據以去找這些書。而清代學者是整理古代文獻最有成就的，有關某問題的資料，往往被搜集得非常繁備，儘可供我們利用，往往事半功倍的，可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我在運用這些材料研究問題時，事先對這問題並沒有預定的看法，總是將有關資料按其產生先後，循序排列，尋其演變之迹，及其與該問題關係的親疏遠近的不同，尋出反映該問題實質的輕重程度，力求做到較繁備地獲得該項問題的資料，進行分析和加以綜合研究，最後得出結論。如果與已有的說法相合，就足以佐證該說法的正確。如果與已有的說法相異，那就不論該說法怎樣具有權威性，怎樣被廣泛承認的定論，那都可毫不管它，理直氣壯地把自己的結論或看法提出來。

問：大陸學者蔣善國先生撰有《尚書綜述》一書，能否說明一下此書

的特色，以及與您《尚書》學著作的相異處？

答：此書我粗粗瀏覽了一遍，覺得此書有一特點，就是將近幾十年來（可能從二十、三十年代起）的各種雜誌報刊發表的有關《尚書》的文章，都儘量加以收集，把其內容按《尚書》篇章次第及有關《尚書》的一些爭論的問題，分別排列起來，排比鉤稽成書，看來作者蔣先生用力甚勤，費了功夫搜集各家之說，加以綜合在一起，所以題為「綜述」。因此書中內容基本集自近人關於《尚書》之說。拙稿與此本著作不同之點，是我沒花那麼多功夫搜集近人之作，例如我研究《尚書》各篇內容的《尚書校釋譯論》一稿，所搜集使用的是自先秦以後歷代以迄清末民初學者的資料，較少顧及到近幾十年報刊上的文章。又如探索《尚書》學流變的《尚書學史》一書，更是詳就歷代研治《尚書》學的原始資料進行撰寫，而在述及現代《尚書》學時，亦是搜尋《尚書》學的一些原本著作，報刊上的文章也沒有時間去找。這是拙著與該書不同之處。

問：目前學者研究經學的風氣，並不熱烈，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每一門學術，必因於社會的需要而產生，而發展。而在學術的長河中，某一門學術也會因學術風會的變遷而興衰。不過，只要在人文領域裏，有某項問題存在，而客觀上需要解決該項問題，就必然有解決該項問題的學術興起。歷史進入工商業經營的時代，一般都認為經學是以農立國的封建時代的東西，因此很少人去注意它。而且客觀需要上，經學對工商業的發展似派不上用場，所以很少人去理會它。何況不止是經學，有很多人文科學方面的學科也不吃香，例如大陸的情況。又日本也有類似情況（台灣情況我不清楚），就是大學畢業生學歷史學哲學的找工作困難，因而報考人數日少，這是一時社會風尚所影響的。但是只要某一門學術社會終於需要的話，則一時冷落它，終必再度受到重視。聽說日本和四小龍，把經濟發展的原因，從思想因素這方面追尋時，歸功於儒學，因而又有人重視起儒學家，重視起儒家經典來。其實我們對於原儒學的恢復，似乎沒有必要，但對孔孟思想中一些有益的教導、有益的道德規範，則仍有學習的價值。則這些教導、這些道德規範的載體——儒家經籍，則仍有把它研究清楚的必要。而且要研究古代思想、古代哲學，則《周易》、《尚書》、《論語》、《孟子》、《公羊》、《穀梁》等，是必須研究的；要研究古代歷史，則《尚書》、《春秋》、《左傳》、《詩經》等，是必須研究的；要研究古代制度，則《尚書》、《左傳》、《三禮》等，是必須研究的。研究這些，稱為文籍考辨之學也可以，

稱為史料研究也可以，沿舊例仍稱為經學，當然也可以。所以一門學術一時冷落，毫無關係，只要它尚有待解決的問題需要解決，則這一門學術之重新活躍也是必然的，其或盛或衰，不足介意。

問：您對《尚書》、《春秋》、《周禮》等經，均有深入的研究，撰寫了不少相當精闢的論著，對於《易經》與《詩經》，必然也非常詳熟，不知是否有撰寫一部中國經學史的計畫？

答：由於我少年時愛好文學，曾讀過《詩經》，也自己翻閱了《易經》，因而對這兩經並不完全隔膜。但自中年以來，一直沒有時間去弄它們了。而上面說到，因需要了解《尚書》本身，而對《尚書》學作歷史的探索時，也需要對整個經學作歷史的了解，因而注意搜集了些經學史資料。大抵注意了各經的傳習、流變，及各歷史時代關於各經的著作文獻，各個時期各經中一些主要爭執問題，等等的資料。但沒有時間去系統整理他們，以致未能寫出經學史來。

問：您目前研究工作的重點為何？

答：我自一九六二年奉調擔任《尚書》整理研究工作後，一直至今，都以《尚書》研究作為我工作的中心和重點。十年文化大革命工作全毀，自一九七六年起，恢復全面整理工作，自是遂以撰寫《尚書校釋譯論》為我的主體工作。迄今已寫出五十萬字，約佔全稿的五分之三。又從整理〈禹貢〉的過程中，發現其問題太多，促使我另行撰寫《禹貢地理叢考》書，已寫出約十四萬字，約佔全稿的三分之一。此二者都尚待繼續從事，大概還需要三幾年時間以求完成。

在我整理《尚書》的主體工作的同時，又因學術界的需要或有關學術機構的邀請，無法謝絕，曾分出精力進行了《左傳》的研究、《周禮》的研究，二書都寫輯成初稿，各需要一段時間把它補充、修訂、定稿，才可出版（如獲集中力量，各需三或四個月時間即夠）。倘使還需要寫《經學史》的話，要一年兩年時間才行。

我除了聽力失聰外，身體健適康強，精力充沛，只要有安定環境、良好條件，我自信可以努力勤勉把這些工作完成。